

第一编

法国哲学精神的确立

小序 :17 世纪法国哲学的历史文化背景

17 世纪的法国，被伏尔泰称作是“路易十四时代”，也被哲学家们称作“理性的时代”。它是法国封建专制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法国近代哲学的诞生时期。整个法国哲学的基调和发展方向就是在这个时期确立的。

到 17 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浪漫和狂热转化成深沉和冷静的思考，对于中世纪旧理论的捣毁代之以独立的新学说的创立。这是一个哲学家辈出的时代，在英国产生了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和洛克，在荷兰出现了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 1632—1677），在德国出现了莱布尼兹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的大氛围中，法国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开端，先后出现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和二元论哲学，伽森狄的唯物主义和原子论哲学，帕斯卡尔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和马勒伯朗士的宗教哲学。他们所探讨的哲学问题成为尔后三百年法国哲学发展演化的主旋律。

这种与中世纪经院哲学截然不同的法国近代哲学绝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背景，作为这一背景主干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在法国采取了特殊的历史形式，从而塑造出 17 世纪法国人特殊的思维方式和理论风格。

一、法国的社会历史状况

16 世纪下半叶长达 36 年之久的新、旧教之间的宗教战争,给法国造成了巨大的创伤,民族面临着分裂,经济几乎崩溃,国家债台高筑,百姓民不聊生,文化艺术蒙受洗劫,不少教堂夷为平地。亨利四世(Henri IV, 1553—1610)接手的是一个满目疮痍、近乎毁灭的法兰西。然而,一纸“南特敕令”(édit de Nantes, 1598)主张宗教宽容,允许信仰自由,使新、旧教化干戈为玉帛,平等地享有自己的利益,结束了可能导致法兰西民族分裂的灾难性内战,重振了因长期动乱而濒临倾覆的专制王权,加上一系列政治、经济的改革措施,重农、重商政策的推行,使奄奄一息的法兰西民族经济起死回生,为封建鼎盛时代的到来准备了必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

17 世纪上半叶,黎世留(Arman Jean du Plessis, duc de Richelieu, 1585—1642)和马扎然(Jules Mazarin, 意大利原名: Giulio Mazarini, 1602—1661)这两位主教的实权统治,对内积极征讨新教和反对势力[如投石党(la Fronde)运动],使得南特敕令成为一纸空文;对外积极参与战争力图扩大法国的疆土。加上继续推行重商政策,大力扶持民族经济和扩展海外贸易,这就为路易十四(Louis XIV le Grand, 1638—1715, 1643—1715 在位)登上历史舞台铺平了道路。

路易 14 在“君权神授论”的鼓噪声中走上了国王的宝座,这位自诩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的“太阳王(le Roi Soleil)”,强化绝对君主制,废除首相,亲躬朝政,加强集权,把传统的地方封建贵族变成了中央政权的附庸,基本上实现了政治司法和财政统一。积极扶持科学、文化和艺术的发展,使法国成为欧洲的强国和大陆文明中心。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太阳王”的统治成为法国封建制度的

黄金时期。从亨利四世到路易十四一直推行的重商政策、加之民族的统一特别是财政的统一，为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正是在这个封建制度的极盛时期，法国的资产阶级日益壮大起来。这个时期的哲学，正是日益壮大起来的法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先进意识形态。

二、法国的文艺复兴运动

文艺复兴运动在法国大约发生在 15 世纪末延续到 17 世纪初，主要表现在拉伯雷、蒙台涅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哥白尼(Nicolas Copernic, 1473—1543, 波兰原名 :Nicolaj Kopernik)、伽利略(Galileé, 原名 :Galileo Galilei, 1564—1642)等人的新兴自然科学思潮的传入，以及古典主义文学的兴盛等三个方面。

1. 拉伯雷和蒙台涅的人文主义

首先，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灵魂的人文主义思潮在 14 世纪产生于意大利，后传播到整个欧洲，16 世纪的拉伯雷和蒙台涅成为人文主义在法国的杰出代表，他们的思想对于法国近代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拉伯雷的长篇讽刺小说《巨人传》(以下五部作品的总称：Pantagruel, 1532；Gargantua, 1534；Tiers livre, 1546；Quart Livre, 1548；Cinquième Livre, 1564)是人文主义的代表作，该书塑造的“特来美修道院”(abbaye de Thélème)和“巨人高康大(Gargantua)和庞大固埃(Pantagruel)父子”是人文主义理想和新兴资产阶级人格的具体化，体现了作者的政治和宗教的主张。在特来美修道院中人人平等，和睦相处。没有繁琐的宗教仪式，没有束缚个性发展的清规戒律，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行事，没有任何外来力量的干预和阻碍，人人都可以充分发展自我，达到完

全的个性解放。该书还痛斥了经院教育和经院哲学烦琐无聊、空洞无物，只能使人愚昧无知，损害了人天生的优秀品质。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特来美修道院所进行的人文主义教育注重教育者身心的健康发展，反对教条式的教学方法，注意观察世界和社会，学习全面的知识，培养多方面的技能，学习生产、经营，做到德智体全面发展，把人培养成用知识和技能武装起来而能够去改造世界和社会、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开创新的时代的巨人。该书还批判了封建制度和教会的黑暗和腐朽，揭露了封建主和教会勒索百姓、欺压人民的累累罪行，他们自己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却要人民实行禁欲主义，甘受奴役。该书宣扬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认为人可以无所不为，可以自由地发财，可以用尽一切办法去追逐金钱。反对经院教育，要求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追求金钱财富，渴望知识、技能，注重生产实践，这些思想是新兴资产阶级意识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成为 17 世纪法国哲学家们注重主体的独立心智和理性的至上性、注重意志自由和自我意识、尊重人的价值及颂扬人的伟大的思想来源。

蒙台涅是法国人文主义的又一杰出代表，因《散文集》（Les Essais 而著称于世。同时因《为塞邦辩护》（Apologie de Raymond de Sebonde）这一长篇散文中深邃的思想，而被视为著名的哲学家。蒙台涅认为，人类一切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对人自身的研究，对人类自身状况的研究，而不是对物质世界的研究。但是在如何研究人、评价人的状况上，蒙台涅又有与其他人文主义者截然不同的特点，像皮科（Pic de la Mirandole，意大利原名：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等人文主义者极力颂扬人的伟大与尊严，把人描绘为宇宙的主宰；而蒙台涅则认为人是渺小的和可悲的，甚至不能主宰自己，人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他常常批评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约 485—411 BC）“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名言，抨击人类的虚荣心和自傲感，大胆地揭露人类的弱点。

作为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蒙台涅重新发现了古希腊怀疑论的财富，特别是古罗马时期的怀疑论者塞克斯都·恩披里可（Sextus Empiricus，生存于公元 2~3 世纪）的著作，从其中借取他的座右铭：“我知道什么？”（Que sais-je?）蒙台涅的怀疑主义和他对人的看法是一致的。他反对“人是有理性的”、“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能运用理性”这种观点。他认为，相信人类的理性可以发现一种真正的知识是人类最大的不幸，是人类的自傲感的一种表现，企图用人类有限的认识能力去认识无限的宇宙和上帝乃是一种盲目和徒劳。蒙台涅运用皮罗主义（pyrrhonisme）的论据来说明，一切事物都是值得怀疑的，所谓真正的知识或者是通过经验获得，或者通过推理获得。然而，我们却不能认识我们所经验的东西的本质，甚至不能认识我们自己的认识能力的本性，我们的认识经常是随着生理的、情绪的状况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在此时作出的或接受的判断，到彼时就会觉得它们是十分可疑的，在此时认为是真的东西，到彼时会被看作是错误的和愚蠢的。每一个所谓的科学真理都被别的真理所取代，哥白尼的新科学就断定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322 BC）和托勒密（Claude Ptolémée，活跃在公元 90—168 年）的学说是错误的，我们怎么能知道将来的科学家就不会作出相似的论断呢？我们的全部所谓的知识是来自感觉经验的，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感官来帮助我们获取知识，即使我们有了足够数量的感官，通过它们所得到的信息也是骗人的和不确实的，我们无法将睡梦与感觉经验区别开来。我们的经验不同于动物、他人的经验，甚至不同于自己已往的经验，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判断经验在何时才是正确的呢？要判断我们经验的正确性则需要一个标准，但是我们还需要某种方法来检验标准，同样也要无穷后退。人的经验只能告诉我们事物似乎是怎样，而不能告诉我们它们的本质是怎样，我们只能根据现象来把握现象，遵从自然而生活。蒙台涅的怀疑论就是要证明，人的愚昧无知、人类认识的低能要摧毁已

往哲学、科学、宗教和道德中的一些信念和现成的观点。因此，蒙台涅被人们看作是具有批判精神的自由思想家。

蒙台涅的怀疑主义是他的宗教观的理论基础。他不相信人类理性的作用，甚至反理性，认为理性不仅不能帮助我们获得真正的知识，同样，我们也不能运用理性去证明上帝的存在。只有皮罗主义和基督教是一致的，它揭示出了人的赤裸和空无，暴露了人性的弱点，使人心成为一块白板，易于接受上帝。宗教的基础不是理性而是信仰，只有靠信仰才能参悟基督教的奥秘，信仰也是我们接近真理的惟一道路。蒙台涅对宗教的这种看法和宗教改革的领袖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的观点是一致的。

蒙台涅的思想对 17 世纪的法国哲学影响极其重大，受其影响最深的是帕斯卡尔，认为最重要的是研究人类自身的状况的思想就是和蒙台涅一脉相承的。一些人文主义者颂扬了人类的伟大、尊严和理性，蒙台涅揭示了人类的渺小、可悲和信仰，这就使得帕斯卡尔在更高层次上进行综合，既让我们看到人的伟大和尊严，又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和可悲；既看到人类理性能力的作用，同时又看到理性的无能和信仰对它的超越。并且帕斯卡尔比蒙台涅更公开地指出了如何通过返回自我、归依自身而走向宗教的大道。

蒙台涅的怀疑论开了 17 世纪一代哲学家的怀疑风气。笛卡尔以怀疑一切为武器，一扫陈旧学说，而为知识寻找一种不可怀疑的基础；麦尔塞纳(Marin Mersenne, 1581—1648)和伽森狄的哲学近似于一种温和的怀疑论，而富歇和于埃则重新取用古代的怀疑论。然而 17 世纪笛卡尔等人的怀疑论与蒙台涅的怀疑论有着很大的区别，蒙台涅的怀疑要说明理性的无能，而笛卡尔的怀疑是以理性为基础的，其目的是要确立理性至上性。

2. 新兴自然科学思潮的传入

文艺复兴运动在法国的另一重要表现，是新兴自然科学思潮

的传入。在黑暗的中世纪过去之后，新兴的自然科学首先在意大利诞生。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 libri sex*, 1543）摧毁了统治一千多年之久、被经院哲学奉为“科学根据”的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全面地阐述了太阳中心说，哥白尼的革命成为科学新时代到来的标志，哥白尼的思想得到了布鲁诺（Giordano Bruno, 1548—1600）和伽利略等人的继承和发挥，彻底地打破了封建神学的自然观，完全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同时，伽利略等人发现了惯性定律、自由落体定律、抛物体定律、钟摆等时性定律等许多自然规律，将通过数学表达出来的这些定律运用于自然界，勾勒出一幅机械的世界图景。这些思想传入经过长期宗教战争后的法国，疲于战乱而无暇研究自然的法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锻造出笛卡尔、帕斯卡尔、伽森狄、麦尔塞纳等 17 世纪法国一代代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特别是笛卡尔的机械唯物主义的自然人观，就是对哥白尼和伽利略等人学说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3. 古典主义文学艺术的兴盛

文艺复兴在 17 世纪法国的继续和深化，主要表现在古典主义文学和艺术的兴盛。这个时期的文学艺术作品都力求在严谨、明晰、和谐和理想主义诸方面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文学艺术相媲美。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 1606—1684）、拉辛（Jean Racine, 1639—1699）的悲剧和莫里哀（Molière, 原名：Jean-Baptiste Poquelin, 1622—1673）的喜剧脍炙人口，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希腊戏剧的特点，到了古典主义戏剧的顶峰。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 1621—1695）的长达 240 首的《寓言诗》（*Fables*），也是对古代希腊的伊索（*Ésope*，生存于约公元前第 6 世纪）寓言和东方传说的精选和凝练。除此之外，小说、诗歌、绘画、雕塑等作品都充分地显示出古典主义的特征，此时的文坛可谓群星璀璨，绝作迭现。文学艺术

的繁荣昌盛给哲学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理智氛围。

三、法国的宗教改革运动

宗教改革虽然是基督教内部的一次调整，然而它是人文主义思潮的传播给基督教带来的必然结果。由路德所首倡的宗教改革，提倡因信得救，主张将信仰建立在个人的基础之上，否定教会的统治权和等级制度，否定封建教会的赎罪理论，主张政教分离，为资产阶级建立廉价的民族教会提供了理论论证。路德的理论实际上表现了市民资产阶级希望摆脱封建教会和封建制度的束缚，获得个人的自由、平等和解放，实现民族和国家的统一，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的要求。

1. 加尔文及加尔文教

路德的思想在法国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几乎是与路德同时，莫城(Meaux)主教布里索内(Guillaume Briçonnet, 1445—1514)和传播路德思想的“莫城小组(Cénacle de Meaux)”就发动了宗教改革，随后，宗教改革思想和新教徒蔓延全国。加尔文(Calvin, 原名: Jean Cauvin, 1509—1564)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理论家。

加尔文虽曾专攻过神学，对《圣经》和古代教父的著作深有研究，但思想深受人文主义者爱拉斯谟(Didier Érasme, 拉丁原名: Desiderius Erasmus, 1469—1536)和路德新教的影响。1533年因宣扬爱拉斯谟和路德的观点而被教会斥为异端，流亡他乡。1536年发表了《基督教原理》(*Institution de la religion chrétienne*)，这成为他阐发宗教改革思想最系统、最重要的著作，与此同时加尔文定居瑞士日内瓦，开始了他献身宗教改革的生涯，建立了加尔文教(calvinisme)，以日内瓦为大本营，并传播到法、英等许多国家，对于整个欧洲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加尔文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器，它比路德的思想更适合资产阶级的要求和需要。加尔文的理论基础是预定论（*prédestination*），他认为上帝创造一切、管理一切，万事万物皆由上帝所预定，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上帝对人有拯救和摈弃，也就是说人的命运也是预定的。人的命运乃由上帝的拣选而决定，不以个人的功罪善恶为转移。人直属上帝的统治，而不应属教皇、主教和神甫的统治，他反对教会的“救赎”理论和教阶制度、等级观念。上帝的预定是一种宿命、一种必然性，任何人也别想改变，任何祈祷、虔诚和苦行也无法改变。但上帝对各个人的预定是秘而不宣的，谁都无法知道自己的命运，因而，上帝预定的这种必然性和宿命并没有排除个人的自由和努力。一个人只有勤奋努力，在从事有善于社会的各种事业中获得成功、取得成就，才能证明他是上帝决定得救的人，人在事业上的成功，就是得救的客观根据。而加尔文所说的社会事业主要是指经济活动，资本主义的生产和金融活动，鼓吹财富并非罪恶，而是受上帝恩赐者的成功标志，因而，凡在经济活动中得到成功所要求的各种美德都被看作是新教的生活基础。

所以，加尔文的宗教理论成为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的理论。他的预定论强调了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其中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客观必然性，他推翻了中世纪教会宣传的教徒要轻视今生财宝、反对经商致富的教条，鼓励人们从事经济活动，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要求。他鼓吹只有勤奋努力、在事业上取得成就才能得救，这体现了一种“宗教个人主义”，鼓励人们为发展资本主义生产而努力奋斗、拼命工作。所以说，“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①此外，在教条和组织形式上，加尔文主张按照民主的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91

则通过投票选举教会管理人员，建立一种民主共和的教会组织。这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要建立民主共和国政权形式的要求在宗教上曲折的反映，因为在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的地方，人间的王国就再也不能属于君主和宗教了，加尔文的新教理论成为荷兰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

新教思想培养了 17 世纪哲学家们的批判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因信称义”、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每一个人都可以独立地理解《圣经》的思想，反映到哲学上来就是在理性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要求人们必须以自己的理性、自然之光为根据，敢于怀疑已往的观念和学说，把一切放到理性的面前重新审视和批判。

加尔文派新教徒后来被称为胡格诺派 (huguenot)，成为法国社会中一支强有力的宗教力量，组织了同原教会分庭抗礼的教会，除了广大的手工业者、农民、下层教士外，一部分主张将教会财产世俗化的王公贵族也改归新教。加尔文教受到了正统天主教会和封建势力的压制和迫害，对抗和斗争不断升级，直到发生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给法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灾难。

2. 奥拉托利会、冉森派和耶稣会

除了与正统教会分庭抗礼的加尔文教派之外，在天主教会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一方面产生了思想特征上与加尔文派比较近的奥拉托利会派 (l'Oratoire) 和冉森派，另一方面产生了顽固坚持正统立场，反对宗教改革的耶稣会派 (Jésuits)。

奥拉托利会是天主教内部的一个团体，1564 年在罗马成立，会员皆是主管教会的神父。法国的奥拉托利会是 1611 年由红衣主教贝律尔 (Pierre de Bérulle, 1575—1629) 创立的，这是一个比较自由的宗教团体，修道士可以个人静修，可以任教区里的本堂神父，也可以当哲学家、神学家和大学教授，主要是根据各人的才能、学识、爱好和兴趣自由地发展。该会主张摆脱中世纪经院哲学的

士这三位哲学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冉森派紧密相连的。

作为正统天主教的维护者,耶稣会(Compagnie de Jésus 拉丁名:Societas Jesu,简称 S. J.)是 1534 年由西班牙人伊纳爵·德·罗耀拉(Ignace de Loyola,西班牙原名:Inigo Lopez de Loyola,1491?—1556)创立的,该会顽固反对宗教改革,强调绝对忠于教皇、无条件地执行教皇的一切命令,服从会条的严肃纪律,通过布道、开办学校、担任封建王侯的忏悔神父,并且创办学校,进行正规的传统教育;像笛卡尔、冉森等人,从小就是在耶稣会创办的学校中学习。该会成为法国社会中正统势力和传统意识形态的代表,是笛卡尔、帕斯卡尔、阿尔诺、马勒伯朗士等 17 世纪哲学家共同反对的对象。

3. 关于中国礼仪的论争

除旧教和新教之间的倾轧残杀、冉森派与耶稣会派之间的争论而外,在 17 世纪的法国,关于中国礼仪的论争似乎也引起了一场不小的波澜,并且这一论争在这个时期的哲学上也得到了反映。

在宗教改革之后,由于新教与旧教分庭抗礼使得旧教的传统势力大为削弱,因而不得不向海外寻求殖民地来壮大势力,这时声称效忠教皇、教会的耶稣会士就成为罗马教会向外扩张的开路先锋,对非基督教国家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当然,这是与资本主义进行原始积累、实行海外殖民贸易紧密相连的。

1531 年耶稣会开始向中国传教,最早来华的是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意大利人,到 17 世纪法国人也开始到中国传教,他们一部分是较早来华的耶稣会士,一部分是较晚的巴黎外方传教会(Société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在 1634—1635 年间以耶稣会为一方,以多明我会(Dominicains)方济各会(Franciscains)和巴黎外方传教会为一方,展开了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较早来华的耶稣会士们认为中国人敬祖、祭孔、祭天系属仪文之礼,而非祀神

之礼，不是异端，应予容留。中国的官方哲学即朱子理学也是有神论；‘理’即上帝、天主。较晚来华的巴黎外方传教会则尚未通晓中国文字，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抱敌视态度，认为中国人的祭祖、祭天是偶像崇拜而非文明礼节，是异端思潮，应予以禁绝，并认为朱子理学是无神论，不能容忍。1645年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巴黎外方传教会一方把关于中国习俗问题向罗马宗教裁判所提出诉讼，1693年巴黎外方传教会驻福建省主教麦格罗（Charles Maigrot，1652—1730，中文名字“阎当”）宣布中国人祭祖敬天为偶像崇拜、迷信活动，严禁习行中国礼典。这不仅使巴黎外方传教会和耶稣会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而且也侵犯了中国主权。更有甚者，1704年罗马教会稽查异端部明文宣布中国之礼实属异端，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Clément XI，1649—1721）帕特使来中国宣布谕旨，这些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触怒了康熙皇帝，康熙下令将他们驱逐出境。

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从1645年开始到1742年止，共经历了百年之久。争论的激烈程度、对欧洲特别是法国思想界和文化界的影响，当时的中国人是难以想象的。正如伏尔泰所言：“在我国到处占主导地位的那种积极活跃、嗜争好讼、喜欢争吵的特性，却没有一次争论比这次争论把它显示得更加清楚明白。”^①这场争论的实质是中国古代信仰和基督教神学的异同问题，以及在传教方法上是否实行科学传教的问题。这场争论本是欧洲人、法国人开眼看中国，遭受文化冲突的结果。而这场争论又反过来推动或吸引了更多的人来研究中国问题，宗教人士、思想家、哲学家及其他的知识界人士都来研究中国，在18世纪上半叶，一时间法国出现了“中国潮”。

^① 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Le Siècle de Louis XIV，1751），吴模信、沈怀洁、梁守锵译，吴模信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594。

当时一位在中国多年的巴黎外方传教会主教李奥纳（Artus de Lione，中文名字‘梁宏仁’），参与了同耶稣会的争论。回到巴黎后向马勒伯朗士介绍了中国的朱子哲学和中国的礼仪，并恳求马勒伯朗士写一本书从哲学上来驳斥中国人，以利于他们的传教事业。于是马勒伯朗士写出了《一个基督教哲学家和一个中国哲学家的对话——论上帝的存在和本性》（*Entretien d'un philosophe chrétien et d'un philosophe chinois*, 1708）一书，在书中指责中国人为无神论者。这样马勒伯朗士就直接卷入了同耶稣会的争论，他本人因此也受到耶稣会指责。而由于马勒伯朗士的解释，中国哲学成为一种唯物论和无神论的哲学，使之成为后来百科全书派的革命武器之一。

贝尔这位 17 世纪的最后一位哲学家、18 世纪的第一位哲学家也曾参加了这一争论，他同样是站在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立场上来反对耶稣会派，认为中国哲学是无神论，利用中国哲学来反对基督教，并把中国社会作为他所设想的“无神论社会的典范”。由上观之，17 世纪法国哲学家的思想，不仅受到了拉伯雷、蒙台涅、哥白尼、伽利略这些文艺复兴的先哲前贤的影响，同时也与宗教改革以来法国内部各教派和宗教团体间的斗争、论战紧密相连，在他们的学说中带有鲜明的教派斗争的特点。这些是我们在研究他们的哲学时所不容忽视的。

第 1 章

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和二元论

笛卡尔是法国近代哲学的开启者，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哲学的创始人。笛卡尔在认识论和方法论领域是一个理性主义者，推崇理性的直观和演绎方法；在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第一哲学”即形而上学领域，他是一个“二元论”者，将“物体”和“精神”看成两个完全独立的实体。而在“物理学”即自然哲学领域，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论证物质世界服从于机械运动的规律。笛卡尔哲学对后世发生了长久的影响，整个 17 世纪的法国哲学是以笛卡尔哲学为中心展开的，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也是以笛卡尔的自然哲学思想为来源，笛卡尔哲学塑造了法国近代哲学中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传统。

第一节 生平著作及哲学体系

笛卡尔在 1596 年 3 月 31 日生于法国西北部都兰（Touraine）地区一个名叫拉·海伊（La Haye）的小镇上，这个小镇如今改名为拉·海伊-笛卡尔（La Haye-Descartes）。祖父是一位医生，父亲和大哥都是雷恩地区不列塔尼议会的参议员。他受洗礼时受名